

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

周雪光 赵 伟

提要: 本文介绍讨论英文文献中社会科学诸领域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关注其中活跃的研究主题和活动、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因果机制,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竞争和对比。我们按照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学科领域来组织本文的述评,但我们强调这些学术研究领域之间的关联、延伸和交融,特别将这些研究工作与组织学的分析概念和思路加以对比,强调它们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的述评一方面肯定这一领域引人注目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特别提出批评性意见,指出这一领域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学术上的种种不足,以期未来的研究加以弥补克服,从而进一步提高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关键词: 组织研究 组织制度 组织变迁 转型社会

一、英文文献中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学术背景

本文旨在介绍和评价英文文献中“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状况。这个领域是我们以“中国组织现象”这一研究对象而圈定的,所以,我们首先来大致勾画一下这个领域及其文献的范围边界。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组织现象”是广义的,即那些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组织方式、机制和过程有关的各种现象和课题,而不仅仅局限于有关正式组织的组织学研究。我们考察的英文文献涉及了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中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工作,如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领域,这些研究工作通常发表在社会科学的英文学术杂志或英文学术著作上。我们的述评特别关注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研究工作,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推动了学术活动;另外,过去 30 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这一述评起始于我们的两点基本观察。第一,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s,即政党、政府机构、企事业组织等等)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毫无疑问,1949 年以来的当代中国一直是一个组织的社会(organizational society),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

编织在各种正式组织(特别是国家统辖的正式组织制度)之中。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正式组织的演变一直处于中国社会大规模制度变迁的中心位置。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转型本身正意味着相应正式组织的变革,而这些正式组织同时又为法律、市场以及其他治理机制提供了组织基础。因此,正式组织在经济活动、公共政策以及人们生活机遇等各个方面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制度转型首先体现在正式组织的变革和创新上,而传统制度和途径依赖也正是通过正式组织的形式和活动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组织现象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大转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第二,“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领域在过去的30年里有了长足的进步和知识积累,使得我们有可能对相关的英文文献加以梳理和评估,并介绍给从事有关研究工作的国内学者,以期推动今后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30年中,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从规模上(研究的数量)到分析的广度上(从各类组织的发展演变到它们对社会不平等、社会群体重组、资源分配以及社会运动的影响)都有着明显的进步。许多研究工作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解释和分析主题,揭示了组织现象发生的内在机制和过程,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组织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的理解认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的许多研究工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组织学研究。我们把这些研究划归在“中国组织现象”这一领域是因为它们有着类似的研究对象,即中国社会的组织现象,或者它们采用了与组织分析密切相关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

在评述有关英文文献的具体研究工作之前,我们在本节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组织研究的学术背景,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学和中国组织现象研究这三者之间的联系。

在英文文献中,社会科学研究和组织学之间有着长期、互惠的学术关系。在美国,组织学成为特定的学术研究领域发轫于二战之后(Perrow, 1986; Scott, 2003)。早期的组织学从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汲取了许多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例如社会学中的韦伯式科层制模型(Merton, 1952)、政治学中利益集团和政治联盟的作用(Lindblom, 1959; March, 1988)以及对政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Downs, 1967),等等。

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和演变,组织学发展起了针对正式组织的结构、过程和机制的一系列理论模型、分析概念、研究工具,以及有关各类组织现象的研究课题。今天,组织学已经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一个专

门领域(Scott, 2003),其中心命题即是:正式组织有着与其他组织形式不同的结构、过程以及运行逻辑,因此需要特定的分析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清晰可见:组织社会学发展起来的的分析概念和解释性逻辑,如新制度理论(DiMaggio & Powell, 1983; Meyer & Rowan, 1977)、组织群体生态学(Hannan & Freeman, 1977)以及网络分析(Burt, 1992)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教育学以及企业管理学科的研究;组织分析的模型也应用于研究社会分层(Baron, 1984)和社会运动(Davis & McAdam, 2005)等诸多领域。在政治学领域,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分析解释政府的决策过程(Allison, 1971)和政治行为的组织基础(March & Olsen, 1989; Moe, 1991, 1994)。在经济学中,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 1985)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明确借鉴了以西蒙、马奇和赛特创立的组织行为理论(Cyert & March, 1963; March & Simon, 1958; Simon, 1947)。而新组织经济学也从组织学经典研究中获取灵感,大量引用韦伯(Weber, 1946)、马奇和西蒙(March & Simon, 1958)、伯纳德(Barnard, 1938)、代顿(Dalton, 1959)和克罗泽(Crozier, 1964)等研究工作。组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在述评中力图突出这样一个主题,即社会科学研究与组织学之间的进一步交融与对话,可以有力地推动和深化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区分“组织研究”与“组织分析”这两个术语(“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vs. “organizational analysis”)。我们用“组织研究”这一概念概括以正式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而“组织分析”则特指那些明确借鉴组织学理论或分析工具的研究工作。

阿利森(Allison, 1971)有关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经典研究为“组织研究”与“组织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分析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过程时,阿利森对比了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式:(1)理性模型,(2)科层制政治模型,(3)组织过程模型。理性模型源于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它假定人们采取理性行动,有前后一贯的目标,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科层制政治模型则反映了政治学的分析视角,强调了科层组织中与政治进程相关的多种因素,如多重利益、部门间讨价还价以及政治联盟等机制。最后,组织过程模型则反映了组织学的理论思路,特别强调正式组织内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机制,如有限理性、满意原则、风险规避以及建立在规章制度之上的组织行为

等。阿利森的研究指出,这三个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决策过程和结果的不同侧面。尤其重要的是,正式组织有着其特定的机制和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因此组织分析的视角不能被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或模型所取代。

但在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领域中,社会科学和组织学研究两者之间的互惠交融才刚刚开始。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各个学科中有着长期的研究传统,这些学科为中国组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早期阶段,各个领域的研究方法相近,以描述、个案访谈和长距离观察为主,反映了当时的学科研究状况。在研究对象上,这些研究尽管偶有跨越学科边界的尝试举动,但基本上还是体现了各自学科本身的特点:社会学家着眼于作为工作环境的正式组织,以及它们对社会流动、社会生活和群体构造的影响;政治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域,比如政策决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及政府组织行为;而经济学家则主要关注工业组织,如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绩效。

近年来,随着中国研究从“区域性研究”(area studies)转向以学科为基础(discipline-based)的研究活动,这一领域在研究课题和分析工具方面既呈现出学科的特点又反映了跨学科的融合。一方面,各学科的方法越来越突出,如经济学的正式建模、社会学的实证统计分析等;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如今,企业行为以及政府内部的组织行为和晋升模式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研究课题;政治学家大量借鉴经济学有关激励和信息的分析概念来解释政治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则对涉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治理机制等课题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在我们宽泛界定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这个领域中,研究活动呈现出多样化格局,引发了不同学科研究课题、理论思路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交流、竞争和融合。但另一方面,组织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在这一研究领域才刚刚发生影响。

本文不能涉及这一文献的所有方面或研究工作。我们有选择地介绍评论一些重要研究课题,梳理相关研究工作的主要线索,并讨论主要的理论思路和研究发现。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按照学科领域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来组织我们的介绍和讨论,并在介绍每个学科领域之后加以简短的评论。但我们在讨论具体学科领域时也会有意地参照对比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强调学术领域之间的差异、联系和对话。在

肯定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特别指出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和研究设计上的不足,以及这些学术领域之间缺乏沟通和积累的状况,并强调组织分析对推动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以商学院为中心的中国组织研究,特别是中国企业研究,有了很大发展。篇幅所限,这一文献不在我们的述评范围之内。

以下章节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我们以学科领域为着眼点来介绍评价该领域中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工作,这些学科领域依次为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具体课题,即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兴衰这一组织现象的多学科研究工作,来对比和讨论不同学科的理论思路、研究风格、分析方法及其局限性。在结语部分,我们对这一文献加以综合评论,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今后研究的课题和方向。

二、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我们首先讨论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有着类似的研究课题(例如社会分层与流动、劳动力市场、组织内部雇用关系等)、研究范式(理论导向下的实证研究)、研究风格(基于定量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研究目的(旨在分析解释这些组织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这20年来,很多研究工作发表在英美社会学学术期刊上,这表明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融入了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主流。

组织社会学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正式组织依赖其所在的特定社会环境而生存发展;与此同时,正式组织又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和过程产生深刻影响。斯廷奇克姆(Stinchcombe, 1965)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详尽的阐述。斯廷奇克姆提出的一个中心命题是,正式组织的产生发展衰亡过程、组织形式和行为活动、组织间关系都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制度环境。这是因为社会环境为正式组织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例如资源(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合法性(如特定的所有制形式)、行为模式(政府法律和文化规范)以及机会结构(例如,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时期的涌现)。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政府治理、文化规范、社会化和制度化过程将个人引入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劳动力市场,为各类组织提供了不同的制度环境,从而影响了这些组

组织的兴衰成败。斯廷奇克姆提出的另一命题是,历史背景对组织的结构和行为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对手工业组织和科层组织的比较研究及其他相关文献,阐述了历史条件(法律制度、宗教组织等)对不同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塑造作用。这一主题在社会学有关组织和工业领域中的权力关系和管理模式的研究工作中反复出现(参见 Bendix, 1956; Guillen, 1994; Hamilton & Biggart, 1988)。最后,斯廷奇克姆提出,正式组织在社会分层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式组织塑造了教育制度和 workplaces 内的依赖关系,成为了重要的分层机制。这一命题预见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组织学研究中有关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热潮。这些研究表明,正式组织在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收入差距诸领域都发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关这一领域的相关评论参见 Baron, 1984; Baron & Pfeffer, 1994)。

在 40 多年后信息化社会的今天,斯廷奇克姆的经典之作读来仍然新颖鲜活,发人深省。这些主题与中国社会现状十分贴近,因此也反映在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中。下面,我们以组织社会学的这些基本命题为起点,来具体讨论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工作。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稳定的正式组织协调安排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改革开放时代前,城市生活完全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正式组织,从教育机会、就业、家庭生活、工资和住房,直至退休和抚恤。在农村地区,农民被编入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组织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有意无意间都涉及到了各种组织现象。例如,白威廉和怀默霆(Parish & Whyte, 1978; Whyte & Parish, 1984)关于毛泽东时代城乡社会的两项综合研究以大量的篇幅详细描述和记录了城市和农村地区工作场合的组织安排,以及在这些组织机构基础上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

在有关中国组织的早期研究中,魏昂德(Walder, 1986)的工作有力结合了区域研究的丰富观察的优势与社会科学的分析力度,堪称典范。在这项研究中,魏昂德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模式来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工厂中雇佣关系的政治机制。这一模型指出,国家统治将中国社会文化中庇护关系和差异待遇等传统做法引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作场所,成为政治控制的有力手段,塑造了独特的组织内部权威关系。这一研究建立在组织分析基础之上,特别是有关工作单位中员

工对其单位领导权威所产生的依赖关系,以及通过对“忠诚”的奖赏而诱发政治服从等制度安排。魏昂德的分析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对正式组织的日常制度安排来理解把握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秩序的基础。

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些早期研究工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把正式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有趣的是,虽然学者们毫无例外地强调正式组织和组织安排的重要性,他们却很少直接应用组织学的概念和分析工具。这一状况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和地域性研究相互隔膜的状态。另外一个特点是,由于研究者难以进入中国的组织内部从事研究工作,组织内部的实际运作过程一直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空白。

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者们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组织现象的空间和机会大为拓展,从而推动了中国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蓬勃发展。在社会学英文期刊中涌现的大量研究论文即为明证(这些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相关评论参见Bian, 2002)。在美国社会学中,倪志伟(Nee, 1989, 1991)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来阐发从传统再分配体制向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产生的影响。这一理论引发了关于中国和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的大量研究。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也相应有了很大发展。我们下面把这些研究工作归为两大主题加以讨论:(1)中国转型经济中的组织变迁;(2)改革时代正式组织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

(一) 中国转型经济中组织变迁的研究工作

在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中,倪志伟(Nee, 1992)、魏昂德(Walder, 1995b)和林南(Lin, 1995)的三篇论文分析阐明了组织现象背后的几种重要社会机制,有着重要的学术贡献。

倪志伟(Nee, 1992)1992年的论文是海外社会学中最早关注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变革的研究之一。它的中心理论观点是,市场崛起导致了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竞争,而这一竞争推动了各类组织形式特别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公司之间的动态演变。倪志伟从他的市场转型理论逻辑推演开来,认为在市场机制条件下,那些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组织(即私营公司)与非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更有竞争优势,更有可能快速增长。因此,随着市场的扩大完善,我们可以预期那些与国家 and 市场有着不同所有制关系的各类组织的命运

兴衰会发生显著的改变。倪志伟进一步讨论了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中混合型产权组织(mixed property rights)的重要性。他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逻辑出发,认为混合型企业的产生有助于适应中国市场制度不足所导致的环境制约条件,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这项研究强调了中国的经济转型中混合型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明晰的理论逻辑来解释和预测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在绩效和生存机遇上的差异。可惜的是,在复杂多变的市场进程中很难明确检验这些理论观点。例如,国有企业的绩效究竟是因为政治机制作用(垄断保护),还是因为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并得益于市场竞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与其他机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魏昂德(Walder, 1995b)强调了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和推动地方企业发展上的积极作用。他提出了“政府即厂商”的基本观点,地方政府被形象地比喻为公司总部,把当地公司作为其子公司对待并干预它们的经济活动。他认为,中国财政改革为基层政府提供了特别强劲的财政激励:“与高级别政府相比,基层政府能够对资产实行更有效的控制”(Walder, 1995b: 270)。也就是说,当行政等级逐级降低时,地方政府的目标和利益与当地企业日趋一致,而地方政府的监控能力又显著加强。此外,由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垄断地位,地方政府有着其他类型的业主无法匹敌的各种优势。由此,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企业的监控能力日益增强。在他看来,那些中国农村和集体经济领域的所谓混合型组织“也呈现出一种公有的形式。在这里,政府有着更明确的激励,也有着更强的能力监控公司和确保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除此之外,它们和大型城市国有部门没有什么差别”(Walder, 1995b: 266)。魏昂德由此提出,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组织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社会网络是社会学中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林南(Lin, 1995)从这一角度对社会网络在中国体制变革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研究天津郊区大邱庄时,林南发现了围绕关键人物角色所建构的、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地方社会主义模式”,着重强调了稳定的社会网络机制的组织作用。林南(Lin, 1995: 310)认为:“地方性合作建立在当地的特别是宗族关系的社会网络之上。这一网络渗透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制度之中并且驾驭其上。这些地方性制度建构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与村庄关系之上,与国家社会主义原则或市场机制毫不相干,也不为其左右。”林南的研究工作提出,在村集体场

域中, 社会网络关系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机制影响了其他的管理形式。

上述三项研究分别分析了中国社会和经济活动中三种不同的组织机制: 市场、地方政府和网络关系。这些学者都把中国组织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从市场竞争经济学、激励机制经济学和网络社会学等文献中汲取了理论思路和分析角度。不过, 这些研究并没有涉及组织学的文献。他们并没有把正式组织作为一个有着独特逻辑的实体, 也没有关注组织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例如, 倪志伟的研究以市场竞争作为主要推动力, 而对非市场机制的持续作用和组织环境的其他方面(如地方政府提供政治保护和资源调动的能力) 则未给予充分的重视。魏昂德的模型隐含着一个假定, 即地方政府如同一个理性经济人(如公司总裁) 那样去行为。但是, 有关科层制组织的大量研究告诫我们, 政府机构并非铁板一块, 身居不同职位的官员有着他们自己的目标, 并不总是与地方企业的目标相一致。对这些组织学课题的关注将极大修正和深化我们对这些机制的认识和解释。

这个领域里的另外一些研究则主要受组织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启发, 并与组织社会学主流的研究课题相呼应。顾道格(Guthrie, 1997, 1999) 根据他在上海的实地调查, 重点研究国有企业如何转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顾道格采用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 强调了组织在应对不确定环境条件中的趋同行为。他利用这一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转型到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和管理实践。基斯特(Keister, 1998, 2001, 2004) 的研究更广泛地汲取了组织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组织间关系的理论观点, 以此来解释企业集团的形成与演化以及企业集团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周雪光、赵伟、李强和蔡禾(Zhou et al., 2003) 的研究集中于企业间的合同关系, 并通过比较框架分析了不同的机制(如制度趋同、社会网络以及交易成本) 在合同关系的不同方面、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学者主要是从组织社会学的文献中汲取研究思路, 并与西方主流研究文献进行对话。尽管这些研究主要采用了定量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他们的分析也明显得益于实地考察和访谈。

在其他有关方面, 社会学家还研究了产权的变化及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戴慕珍和魏昂德(Oi & Walder, 1999) 编选了关于正式组织的各种产权配置变化的一组实证研究。陈志柔(Chen, 2004) 研究了3个农村地区不同的地方制度如何形成了不同的产权形式。此外还有一些

关于产权结构和公司行为的研究 (Peng, 2001, 2004; Zhou et al., 2006)。但是, 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无持续发展的趋势。

(二) 正式组织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长期以来, 有关中国组织的社会学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副产品。工作组织在人们生活机遇的分配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在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尤其如此。因此,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聚焦于正式组织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用。与此相应的是, 有关正式组织的研究也大多置身于社会分层研究的框架之内, 记录和分析了中国转型经济中社会阶层与结构的演变趋势。

这些研究工作(特别是有关城市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强调指出城市生活中各类工作组织间的等级结构及其对生活机遇的影响。例如, 在计划经济时代, 不同组织类别——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员工之间在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工作环境诸方面有着明显而稳定的差异。林南和边燕杰(Lin & Bian, 1991)以及魏昂德(Walder, 1992)较早地提出了关于工作组织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理论观点。边燕杰(Bian, 1994)系统考察了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工作组织对城市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正式组织间等级制度这一观察也已被应用于研究中国转型经济中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与延续(Bian & Logan, 1996; Nee & Cao, 1999, 2002; Walder, 2003; Zhou, 2004)。最近, 王丰(Wang, 2007)系统研究了基于稳定的组织制度基础上的“类别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政治学家对“单位”现象也显示出一定兴趣(Lu & Perry, 1997; Solinger, 1995), 但这些兴趣似乎未能持久。

早期的分层研究大多以个人收入为分析焦点, 这一方面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 另一方面, 大规模调查收集个人收入的信息相对容易, 而对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如住房、财富、社会地位)的资料收集则有着不少困难。另外, 因为组织结构在分层过程中的作用以城市最为突出, 故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城市地区。与主流社会学社会分层的研究类似, 这些研究通常以大规模统计资料为基础, 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个人层面上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随后的研究从对个人收入的关注拓展到其他方面。例如, 戴慧思(Davis, 1992)和周雪光等(Zhou et al., 1997)研究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工作流动模式, 以此对体制变革的方

向和程度加以评估。其他学者也研究了其他利益资源的分配模式,特别是工作单位对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且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Bian et al., 1997; Shu & Bian, 2003; Zhou & Suhomlinova, 2000)。

在过去20年里,有关中国组织中官员和管理人员流动和升迁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领域。特别突出的是魏昂德和他的研究团队(Li & Walder, 2001; Walder, 1995a; Walder et al., 2000)提出的双路径模型。这一模型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的政治逻辑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道路:一个是基于政治标准的政工干部职业途径,另一种则是基于专业技能标准的专业途径。这两个职业道路受控于不同的机制,导致了不同的职业生涯模式和生活机遇。周雪光和他的合作者则提出了另外一个模型,强调政治变迁过程对组织内部升迁的影响,尤其分析强调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政策和选拔标准的变化对官员录用和晋升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升迁机遇(Zhao & Zhou, 2004; Zhou, 1995, 2001)。边燕杰、舒晓灵、洛根(Bian et al., 2002)和曹洋(Cao, 2001)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似的论点。而臧小伟(Zang, 2001)则强调了正式教育经历对组织内晋升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也大多应用统计模型来分析调查数据,进而展现了跨越不同工作组织和历史时段的整体图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对这一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于政治学研究,见 Lampton & Yeung, 1986; Li & Bachman, 1989)。经济学家李宏宾和周黎安(Li & Zhou, 2005)研究了改革期间“政绩激励”与省级领导人的晋升状况。与社会学家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明确提出了中国政府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并用定量数据加以检验。

对中国组织现象的分析研究也影响到了社会学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李静君(Lee, 1995)研究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的劳工关系,尤其是性别在工作场所的工作分工和权力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她使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手段,对劳工关系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对工厂里工人的情感、期望和生活经验提供了丰富的描述。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李静君(Lee, 1999)发现,在改革时代的广州,工作场所里正在产生的雇佣关系与新传统主义的依赖关系不同。这些新的雇佣关系模式的组织基础反映为从福利家长制到福利商品化的转变、对庇护关系的依赖以及管理权力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社会学家尤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正式组织在

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在这一方面,组织分析也加深了我们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理解。在早期研究中,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 1985)提出了等级市场结构的模型,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农村区域性经济体系的组织分析范例。施坚雅和温克勒(Skinner & Winckler, 1969)关于中国农村政策周期性变化的讨论近似一种组织分析。他们分析了政府政策的实施和农民的应对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了正是农民应对行为对政府产生的压力才导致了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动。在这里,国家不再是将其意志强加于社会的全能威权,国家政策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随着这种互动而不断演变。周雪光(Zhou, 1993)将组织分析应用于对中国的集体行动的研究。他的研究着眼于无组织的利益集团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消极无为”的作用。这一理论模型强调了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中心的制度安排,指出正是这些制度安排无意间将无组织的、有着不同利益和诉求的个人聚集到一起,诱发了直接针对国家的集体行动。李静君(Lee, 1998)将“集体消极无为”的概念用于考察后毛泽东时代广州的劳工运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赵鼎新(Zhao, 1998)则强调社会生态分布的重要性,提出了居住地和工作场所的生态分布对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源动员起了关键作用。

让我们对以上介绍的社会学领域中“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整体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评论。应该肯定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中国组织的社会学研究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一方面,如我们上述评论所示,社会学期刊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这些研究涉及了组织现象的不同侧面,从组织内部的升迁模式、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到它们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影响。从质量上讲,这些研究中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的清晰程度、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质量以及研究设计的严谨恰当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与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地域研究)相比,最近发表的研究可以与西方社会学主流的研究活动直接进行交流对话。

另一方面,社会学领域中的中国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明显的问题与挑战。在这里简要地列举如下:第一,中国组织研究和组织学(包括组织社会学)文献之间缺乏相互的交流。虽然在一些课题上(例如劳动力市场与正式组织关系)借鉴了组织社会学的研究,但许多研究既没有明确采纳组织分析的理论和分析模型,也没有与主流社会学有关课题和已有文献进行认真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尚游

离于组织学研究的主流之外。第二,在研究风格方面,对中国组织的研究中缺乏近距离观察和敏锐洞察。近些年大多数的研究都是根据问卷调查或长距离观测,倾向于借鉴已有的理论框架,而不是通过近距离观察来深入理解组织的实际运行过程,从中提炼出有关组织现象的规律和解释框架。这种研究风格也导致了现有文献在组织微观机制和过程层面的知识空缺。第三,这一领域里缺乏知识积累。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前面讨论的研究中,我们很少提及这些研究工作自觉地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因为这些问题与研究中国组织现象的其他学科中的问题相仿,我们将在本文的结语部分进一步展开讨论。

三、中国组织现象的政治学研究

中国组织现象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制度、政府行为,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研究大多从政治学的观点和主题出发,但它们大多分析或涉及了中国的各种组织现象。近年来,政治学家越来越多地引入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和工业组织新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概念,强调了政治过程中激励、信息和资源分配等机制。我们以下的述评着重强调这些研究和组织学研究文献之间的联系。

从早期的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模式开始,政治学家很早就认识到正式组织对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政策制定、政治控制和经济发展诸方面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多元利益集团的理论模型对苏联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多元利益集团政治行为的研究(Griffiths, 1971; Skilling, 1966),从而明确提出了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有所依赖的组织基础(如部委、行业和经济部门)。此后不久,这种从专制模式到多元化模式的视角的转变进一步拓展到对中国的研究上来。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和冲突也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动因之一。邹悦(Tsou, 1986)对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政治机构的内部矛盾和冲突的组织分析。

在政策制定、政治控制和资源分配等方面,中国国家机器依赖于精密的科层政府组织。因此,中国政府的科层体制很早就成为了研究重点。舒尔曼(Schurmann, 1968)的早期研究注意到在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科层体制的作用。何汉理(Harding, 1981)则系统研究了中国政府组

织体制的演化,特别是从 1949 年到 70 年代后期的相关问题。在社会学里,怀默霆(Whyte, 1973, 1980, 1985)的早期工作对中国政府科层制度进行了最为集中的讨论。怀默霆(Whyte, 1973)在解释毛泽东对官僚机构积弊的批判时,特别指出了韦伯式的科层组织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科层体制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所修改的韦伯理想类型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有关科层机构的理念,其中包括由专门职位构成的等级制度,并以人们的技术能力作为任命和提拔的标准。中国领导人并不主张建立没有等级制度或专门职位的组织,但反对强调技术能力。他们并不忽视教育和技能的问题,但他们对政治上的纯洁也非常看重……”(Whyte, 1973: 150);“中国共产党不认同科层理想类型中所包含的威权理念。他们对于威权以理性和法律为基础以及对大型、复杂组织中的等级制度和恭顺服从的看法态度完全是模棱两可的”(Whyte, 1973: 152)。

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为解析中国科层制度和中國组织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框架,并且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的研究课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对国外研究人员敞开了大门之后,有关中国组织的政治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至 90 年代中期已积累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文献。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政府的科层组织,其中由以兰普顿和李侃如的一系列论文和编著为代表(Lampton, 1987; Lieberthal & Lampton, 1992; Lieberthal & Oksenberg, 1986, 1988)。这些研究提出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模型(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认为“在中国政治体系巅峰之下的权力分布是分离的和不连贯的”(Lieberthal & Lampton, 1992: 8)。碎片化的权力可以归结于中国科层体制的结构。“中国的科层等级体系与各科层部门的权力职能分工相结合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常常要求各个部门达成一致,而任何一个单独机构均无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的权威。此外,改革中预算权力的下放使许多地方性科层机构获得了中央财政拨款之外的资金来源,促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追求自己的政策偏好”(Lieberthal & Lampton, 1992: 8)。这种碎片化的局面也得益于改革过程中较少政治压力、较少意识形态的宽松政治氛围。其结果是,科层机构之间的协商以及它们在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如何达成共识成为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前沿地带。杨大利(Yang, 2004)对中国科层机构进行了更为详细和系统的研究,其中特别集中讨论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市場扩张过程中建立在

科层体制改革基础上的国家建构。

这一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中国科层制度中的权威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p),特别是关于政策决策制定和下级组织执行实施之间的关系。谢淑丽(Shirk, 1993)的研究思路与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十分接近,她进而对决策过程中政府部门间的协商和建立共识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她的研究指出,改革中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给予政府部门更多的自主决定权,而领导者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相互问责制”(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给政府部门间讨价还价的科层结构提供了约束。她还指出了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通过一致意见而下放权力”的特点。这些讨论展示了政治过程高度多元化、广泛存在的讨价还价以及把不同的部门利益纳入决策过程之中等特点。这是理解中国改革渐变道路的关键所在。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国家能力和日益增强的社会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学者就这一方面的看法分歧很大(Perry, 1989),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分析重点各异,另一原因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许慧文(Shue, 1988)的“蜂窝”模型描绘了中国地方局域上的模块化结构,其中地方村庄和社区的边界与外界分隔并得以强化,从而能够有效地抵御国家的进入。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家的强权能力和触角所及范围都受到了很大限制。弗里曼等(Friedman et al., 1991)对这一解释思路提供了详细的实证研究。他们不仅详细分析了集体化时代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巩固,同时还揭示了传统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设施对国家正式组织进入农村的成功抵御。如他们所述:“正像他们的祖祖辈辈在历朝历代所做的一样,村民们和他们在官场中的盟友与保护人试图回避、转移和顿挫那些损伤地方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国家诉求的影响。那些负面影响逐渐削弱了新中国一度深得民心的合法性”(Friedman et al., 1991: XV)。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对乡村文化和农户经济宣战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横遭苛敛的村民更加紧紧抓住从家庭、宗族再到婚姻的纽带,以此来维持延续近乎神圣的家庭资源”(Friedman et al., 1991: 269)。与此不同,戴慕珍(Oi, 1989)的研究发现了在农产品分成过程中政府官员和当地干部、村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蔡莉莉(Tsai, 2007)的新近研究工作则提出,在正式政府功能缺失的农村中,社会设施(如家族社区)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提供公共产品)。20世纪80年代行政权力的

下放引发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深远变革。欧博文和李连江(O'Brien & Li, 1999) 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能够选择性地执行政策, 而金山爱(Edin, 2003) 则侧重研究了地方政府在日常工作环境中的能力。但权力下放过程并非一条单行道, 与此并行的还有增强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的组织设计。黄亚生(Huang, 1995) 讨论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权力下放期间行政监察在中国政府体制中的作用。周雪光(Zhou, forthcoming) 从组织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各基层政府间在应对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互相庇护的同谋行为, 并特别强调指出了这一广泛存在的组织现象背后的制度逻辑。

有关中国科层组织权力关系的传统分析框架已不能解释地方政府在改革时代显著的、积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角色随之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黄佩华(Wong, 1991) 讨论了改革早期的财政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戴慕珍(Oi, 1992) 提出了“地方国家法团主义”的模型来概括在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权力和经济活动之间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交织的特点。她的主要论点是, 财政改革, 特别是分享财政收入的政府组织设计, 刺激了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增长和促进当地企业发展。戴慕珍(Oi, 1999) 随后对在新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农村工业的作用提供了经验研究。她追溯了激励机制设计(比如财政收入分享、业绩考评) 的变化如何诱导地方政府转变行为, 从保护集体企业到积极促进私营企业。按照类似的逻辑, 白苏珊(Whiting, 2000) 对中国政府组织中的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进行了详细讨论。她的研究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工业的发展, 而分析的重点则是中国政府机构中最低的行政级别——乡镇政府。但是, 黄亚生(Huang, 2003) 在分析改革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府对待外资政策时, 则对被刺激诱导和扭曲了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当然, 官员行为的激励因素并不仅仅来自政府组织内部, 不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可以为企业界所“捕获”。王达伟(Wank, 1999) 的研究指出地方官员如何与私营企业互动, 并为之提供政治保护。然而正如皮尔逊(Pearson, 2007) 指出的那样, 鉴于主要商家和监管机构常常源于先前的同一政府组织, 这一制度遗产使得我们很难分辨究竟是商界“捕获”了监管机构还是监管机构力图保护其近亲组织。

政治学研究中另一个活跃的领域是对中国农村中乡村选举制度的分析。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乡村选举制度兴起和演化过程中有关选举

方式的各个方面。因为篇幅所限,我们对此领域不加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欧博文和韩就此领域 20 年间发展所做的述评以及相关评论(O'Brien & Han, 2009)。

让我们简要总结一下中国组织的政治学研究和组织学文献的联系。

从组织学研究的角度,我们下面讨论政治学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特点,特别着眼于这些近期研究和组织学文献之间的联系。首先,上述政治学研究突出强调了正式组织(如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在组织中国社会和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都强调了政治利益和政府体制的组织设计,以及它们在政府机构之间协商、政策制定及国家组织和发展能力上的作用。这些研究与组织学研究之间有许多并行的主题和方向,但是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溪流很少交汇,更少互动。政治学对政府行为的近期研究受到新组织经济学的极大影响。这些研究大量借用理性选择模型,将激励机制、信息和战略互动明确用于组织分析,这也反映了政治学中的总体趋势。与经济学的影响相比,组织学研究对政治学的中国组织研究则鲜有贡献。虽然组织学文献中对组织内部和政治过程的决策和实施已有不少研究(Lipsky, 1980; Pressman & Wildavsky, 1984; Wilson, 1989),而政治学学者对这一丰富文献似乎不甚了解。例如,兰普顿和李侃如编纂的论著(Lieberthal & Lampton, 1992)对组织研究文献几乎没有任何提及。这一学术缺陷的后果是中国组织现象的“中国特色”常常被夸大,而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科层机构的相同相似之处往往被忽略。

第二,许多有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与组织学研究中有松散关联(loose coupling)的分析之间颇有相似之处(March & Olsen, 1979; Meyer & Rowan, 1977; Weick, 1976, 1982)。组织文献详细阐述了不同组织形式在适应当地复杂环境时的优劣,对探讨和解释经济改革中中国的分权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有着启发意义。在与此相关领域中,组织分析中有关“渐进适应”(muddling through)的理论模型(Lindblom, 1959, 1979)也从组织学角度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战略下政策决策和政府机构间协商的特点提供了解释思路。近年来政府部门重新集中化和加速科层化,并引入了许多新的监管和执行机制,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的能力。不理解中国政府作为一个科层组织的能力,就无法解释和预测这些制度变革的潜在意义和长远影响。

最后,政治学研究侧重分析正式的制度和结构,而对中国组织的非

正式制度以及行为活动方面则较少注意。许多研究过分依赖国家政策和官方统计数据来进行因果解释,而对于政府机构的实际运作则鲜有仔细观察。即使那些建立在广泛实证调查基础之上的研究也大多忽视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活动。因此,这些研究往往描绘了中国政府体制的“官方面孔”。从这一角度来看,政府行为常常是理性的,反应灵敏,并且目标明确。但是,政府官员的实际行为和担心顾虑,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研究中尚未有深入涉及,以至于我们对中国政府机构内部运行的过程知之甚少。例如,许多研究强调地方经济增长是支配当地政府官员活动的主要刺激动力;然而,政府主管领导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在官场中按时晋升,而这取决于上级部门的选拔。同时,国家实施地方干部轮换政策,而对选拔干部又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是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指令和政策的转变极为敏感。不难看到,地方官员时常会面临发展本地经济和执行与此冲突的上级政策之间的两难困境。那么,地方官员如何应对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在这些目标任务间取舍呢?他们在实际过程中是如何解决当地问题的?这些课题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就此而论,中国国内学者对政府行为的研究,特别是那些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对政府内部的行为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有着独到的贡献。这些研究工作对英文文献中有关正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有益的均衡。由于篇幅限制,我们这里无法介绍相关的中文文献。

四、中国组织现象的经济学研究

近年来,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契约理论为工业组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这些模型和工具进而被应用于研究转型经济和政府公共机构(Dixit, 1996; Milgrom & Roberts, 1992; Tirole, 1986)。引入组织经济学的正式理论促进了中国组织研究的严谨分析和理论洞察。在本节中,我们主要讨论那些建立在经济学新组织理论基础上,围绕着信息、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展开的研究活动。

(一) 组织形式的制度分析

钱颖一、罗兰和许成刚的研究着眼于中国和东欧转型经济体的不

同改革经历,并采用了组织经济学的新近理论加以解释说明。在此基础上,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比较和解释不同组织形式在创新性、效率、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适应、不完善条件下的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异同,并且关注了转型经济混合产权的特点(Qian et al., 1999, 2006; Qian & Xu, 1998)。他们特别对两种理想类型的组织形式——U型和M型——的设计属性和相对优势分别建立模型并加以对比。根据钱颖一等学者的定义,“M型(multidivisional form)组织由‘相对独立的单位’组成;在这些单位内,功能互补的任务被组合在一起”。而“U型(unitary form)组织是由‘专门化单位’构成;这些单位内部将可替代或相似任务组合在一起”(Qian et al., 2006: 369)。这里强调的重点是这两种组织形式在不同制度条件下进行协调合作的相对优劣。由于组织设计要么强调属性匹配(attribute matching)要么强调属性互补(attribute compatibility),这两种形式在创新性和效率上往往难以兼顾。这些研究指出,U型组织在实现专业化和规模效益上有优势;与此相反,M型组织则在“属性匹配”上有着更好的协调关系,但在“属性兼容性”方面的协调以及专业化收益方面则较U型组织逊色。另外,M型组织在选择试验规模大小以及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实现组织创新时更具灵活性。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分析角度上来看,一个明显的意义是,U型组织在稳定的环境中并且使用现有技术的环境下更具优势,而M型组织则具有将互补属性加以组合的特点,因而能够较好地解决当地的问题和应对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

钱颖一等(Qian et al., 1999)这项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组织形式影响组织的信息结构和协调变化的方式。他们利用这一框架来解释中国和东欧国家的不同改革之路——试验性的渐进方式抑或休克疗法。他们将这些差异归结于这些国家历史上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的组织结构:在东欧是U型组织,而在中国是M型组织。正如他们所言,M型组织更加灵活,从而使地方性的实验探索成为可能;与之相反,在U型结构下,地方上的实验探索会给改革进程中的协调合作带来很大难度。本着同样的思路,钱颖一和许成刚(Qian & Xu, 1998)比较了科层体制(软预算约束)和财政限制(硬预算约束)作为选择项目的筛选机制(即对创新的组织选择)的差异。在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科层体制很少选取类似并行的项目,因此减少了重复性浪费。但另一方面科层体制的多重机构和分散的组织利益却也可能导致非优化的组织形式和做法。与

此有关的是黄亚生(Huang, 1994)的一项研究。他从中国与苏联的政府组织收集加工信息的特点这一角度分析了两国在改革初期的不同经历。

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有几个优点。首先,通过建立正式理论模型,这些研究阐明了不同组织形式在什么条件下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及其原因,并为政府介入监管的基础以及正式组织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解释。其次,这些理论思路对理解中国的组织变革有直接的意义。让我们将这一思路加以拓展来思考一下近年来中国科层体制内权力和资源重新集权化的趋势。中央政府集权化的特点是通过专门机构(例如部委)来加强垂直控制。借用上面的研究框架,这样做的直接含义是强调对“匹配属性”进行组合,即把功能相同的部门通过纵向的联系加以整合;与之相反,以地域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的特点是“属性互补”,即在地方政府内包含了各种互补匹配的部门、机构,以利于解决当地问题。换言之,政府机构的“条条”(垂直领导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块块”(地方政府)的形式分别类似于U型与M型组织。以乡镇政府为例。它的前身人民公社基本上是一个M型组织,整合兼容了多种功能。但在改革过程中,基层政府权力急剧削减,比如失去了税收和土地管理的权力。这些互相兼容的属性功能被按照各自功能在纵向上加以整合。这种制度安排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解决当地问题和应对危机的能力。由此可见,针对不同管理制度结构的组织分析对理解组织变迁的实际过程和结果大有裨益。

如我们上文所述,这些讨论与组织学文献中“松散关联”的论点有许多类似之处。松散关联指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以及象征做法和实质内容之间保持着一种松散灵活的联系。组织学的视角凸现了组织与复杂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松散关联的组织形式具有灵活性优势,可以及时调整应对不确定的当地环境。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流会大大加深我们对中国组织和制度变革的认识。

(二) 集权、分权和联邦制

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Montinola et al., 1995; Qian & Weingast, 1997)的研究关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这一主题。他们提出了“中国特色的联邦制”的理论模式,以此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改革战略及其成功结果。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明确采用了经济学中新近的组织理论,进而

阐明了“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如何重新加以构造,从而在市场互动中将管理人员的奖惩激励与股东的切身利益协调一致”(Qian & Weingast, 1997: 84)。

“中国特色的联邦制”模型的分析重点集中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它的出发点是承认“一个经济体系面临着根本上的两难困境:它不但依赖于政治机构来具体规定和实施产权和合同,而且也依赖政治制度来保护市场免受政治的侵蚀”(Qian & Weingast, 1997: 79)。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的联邦制”这一制度用“联邦制”的可信承诺来维持市场的激励机制,从而提供了一个解决两难困境的办法。“联邦制”还有利于实施硬预算约束,从而强化了市场对组织行为的约束(Qian & Roland, 1998)。该文明确指出了这一模型的五个条件:约束并划定权力范围、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经济负有主要决定权、中央政府对跨地域的市场交易实施有效的监管、硬预算约束、在权力和责任分配上实现制度化基础上的持久性。在这一联邦制的体系中,中央政府要么受到约束要么是自律的,但它仍能有效地推行货币政策,实施硬预算约束,并监管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促成保护市场化的联邦主义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在制度安排中嵌入政治持久性,从而使权力下放并非中央政府的一时之举”(Montinola et al., 1995: 53)。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这一新的政治体系“对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相当的政治保护,其中包括对中央政府的约束”,并通过权力下放来维护市场机制(Montinola et al., 1995: 52)。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央政府对联邦制度持久性的“可信承诺”是否真的值得信赖?作者们简要陈述了下列条件:“首先,中央政府必须获得足够的资源以防范下级政府的消极怠工;第二,下级政府必须有联手报复的能力以便防范中央政府的滥用权力”(Qian & Weingast, 1997: 90)。作者似乎很乐观,援引了一些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案例作为根据。然而,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中央政府在权力和资源这两个方面相对于地方政府均最为孱弱的时期。恰恰是于此之后,中央政府对决策权和资源大力进行集中控制。这一变化对“中国特色的联邦制”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提出了疑问。

如我们前文所示,上述研究工作大多提出了正式的理论模型,并利用组织经济学新近的分析框架来研究解释中国组织现象,从而明显提高了其分析的缜密程度。正式建模研究风格的特征之一是将其分析置

于一个特定的分析框架中,有着明确的假设前提,从而可以有选择地对某一特定机制加以分析(Mookherjee, 2006)。例如,一些研究集中分析组织中的逆向选择困难,但对于组织内部的交流成本忽略不计;而其他一些研究则侧重于不同组织形式在效率和适应性之间的利弊得失,而对与这些组织形式相关联的利益因素则省略不谈。因此,在借鉴这些理论研究时,必须关注这些前提假设以及特定的分析框架,才能充分认识这些模型的内涵和局限。

(三) 基于经验观察的实证研究

与正式建模的研究风格不同的是传统经济学中对中国企业的研究,即在实证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组织展开的经济学分析。这一类研究文献涉及了中国企业在转型时期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企业的改革战略和成长轨迹(Naughton, 1996)、国有企业的演变和绩效(Jefferson & Rawski, 1994, 2002; Jefferson et al., 2000; Rawski, 1995),以及管理阶层的兴起和特点(Groves et al., 1995),等等。与主流经济学流行的正式理论模型风格迥异,这一类学者置身于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对中国组织变化的背景和正在演变的过程极为熟悉,从而为他们的深入分析和理解把握提供了基础。这种研究取向对变革中的中国组织现象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描述和更为贴切的分析。

最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绩效”是关于中国组织现象的经济学研究中曾一度活跃的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不但正式建模和实证研究交汇在一起,而且不同学科的研究也在这里呼应交融。我们将在下一节集中讨论对乡镇企业的跨学科研究,并以此为契机来比较不同学科中的研究思路和风格。

五、一个案例研究: 乡镇企业的跨学科研究

我们上面讨论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学科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工作。为了更好地阐述对比不同学科的分析模型和理论思路,我们现在聚焦对比这些学科在一个特定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即对改革时期乡镇企业兴衰演变这一组织现象的研究。我们选择这一领域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乡镇企业以其独特的组织形式以及与传统体

制、地方政府和乡村集体的特殊关系,向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使之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研究个案。第二,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都对乡镇企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活动为我们进行跨学科的比较评估提供了理想的学术案例。最后,乡镇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群体,历经令人眼花缭乱的兴衰沉浮,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戏剧性的消失,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认识中国组织的演变机制具有战略意义。对这一组织现象研究活动的总结也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科学有关中国组织研究的范式进行反思。

在林林总总的社会变革之中,社会科学各学科对乡镇企业倾注了特别的学术兴趣和研究热情。这是不难理解的。首先,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出色表现在中国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全国工业产值的78%来自国有企业;到1993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43%,而非国有企业则提供了总产值的57%。在非国有部门当中最活跃的部分是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它们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9%,飙升至1993年的46%。在农村产业中,乡办和村办企业(乡镇企业)约占农村工业总产值的3/4,或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以上”(Che & Qian, 1998b: 1)。此外,乡镇企业又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组织现象,有其独特的产权形式和行为模式。众所周知,乡镇企业大多为集体所有,其管理团队的主要领导由地方政府任命。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乡镇企业的产权界定模糊不清,地方政府、村庄集体以及当地村民均可宣称对其拥有部分产权。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在规模、技术和资源动员能力方面也处于劣势。

因此,乡镇企业现象本身以及它的成功崛起的确令人困惑:如何解释乡镇企业在看似不利的所有制结构和体制环境下取得的突出成就?显然,乡镇企业现象对经济学的一般产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正如诺顿所说:“乡镇企业的神奇之处并非它们在缺乏明确产权界定的条件下运作,而是地方政府所有权居然成为了一种相当稳定强劲的所有权形式……”(Naughton, 1994: 268)。自90年代初期以来,许多研究正是力图回答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

被称作“趋同学派”(convergence school)的一些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组织形式是针对不完善的市场竞争制度的一种对应策略。由于中国经济过渡的特点,企业面临着多重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强势的政府和不

完善的市场条件并存的局面。在社会学研究中,倪志伟(Nee, 1992)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地方集体参与建构的混合产权为乡镇企业适应多重环境提供了优势并且增强了它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正如倪志伟所述:“转型经济的特点是市场结构薄弱、产权界定不清以及制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仅市场交易成本高昂,而且再分配的成本也相应增大。在这种有限改革的制度环境中,混合型产权(mixed property rights)的企业与其他产权结构的企业相比,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占有优势。但是,从再分配体制到市场制度的持续演进会引发不同治理形式相对成本的变化。随着市场在转型经济中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以及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逐步完善,这些基本环境条件的变化会导致混合型产权治理模式的成本增加,而私营企业的成本则会相对降低”(Nee, 1992: 4)。

上述“趋同学派”理论思路着眼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强调指出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是一种过渡性的组织现象。也就是说,随着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发展完善,产权明晰的私营企业会更加适应新兴的市场机制,而混合产权的乡镇企业则会逐渐处于劣势。因此,这些企业最终会“趋同”,转型到明晰产权界定的企业形式(Woo [1999] 对这一思路和文献作了论战火药味极浓的总结阐述)。

参与这一学术争辩的另一派学者则着眼于乡镇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上的优势。虽然他们也认为乡镇企业的独特形式源于组织对环境的适应,但是他们更多地将乡镇企业的成功归功于地方政府和社会机制更为出色地解决当地问题的能力,因为它们(1)有更有效的监督机制,(2)有长期合同关系,并且(3)能保护企业免遭来自国家的掠夺。我们下面重点讨论这一流派的一些研究。

在这一领域中,经济学家张春和王一江(Chang & Wang, 1994)较早尝试从乡镇企业所有权的不同方面提出解释。他们认为,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他们的模型强调了地方政府和居民两方的作用:虽然地方政府可能是乡镇企业的主要决策者,当地居民却是乡镇企业的主要受益人。在他们看来,这种产权结构反映了中国的制度现状。乡镇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资源调动方面占据优势,它还提供了基于当地居民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可信承诺。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调了技术和就业在乡镇企业和私营公司的管理模式中的不同作用。

为了解答乡镇企业产权模糊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韦茨曼和许成刚(Weitzman & Xu, 1994)提出乡镇企业的成功可以归结于它解决组织内部问题的能力。“所有权的意义与在缺乏正式规则条件下有效率解决组织内部问题的能力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在很多情形下,这种解决组织内部问题的能力为特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Weitzman & Xu, 1994: 139)。从这一角度看,如果一个社会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合作,“即使没有正式明确的所有权界定,当事人们仍然可以基于相互的关系进行投资或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必要明确界定一个所有者及其明晰的权利,以将他人排除在其资产之外”(Weitzman & Xu, 1994: 140)。换言之,因为乡镇企业植根于当地文化环境,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组织合作的问题,因此不需要明晰的产权界定。

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将地方政府的作用置于解释的中心地位。车家华和钱颖一(Che & Qian, 1998b)认为,社区政府参与乡镇企业“帮助克服了私营企业所面临的国家掠夺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比,它还强化了更严格的预算限制,从而赋予了乡镇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上的特殊优势。此外,他们还指出:“因为‘地方政府所有权’整合了当地政府的行为和商业活动,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央政府的利益。因此当地政府的所有权可以有效地限制国家的掠夺行为,增加当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降低为隐瞒财政收入而付出的高昂成本”(Che & Qian, 1998a)。他们依据正式模型明确指出了乡镇企业成功的边界条件:“当政府的监督成本增加或私利增加(比如从推行其政治任务中获益)或者当企业家积累了更多的财富时,乡镇企业则有可能消失”(Che & Qian, 1998a: 17)。这项研究分析论证严谨,通过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比较静态分析,细致阐释了乡镇企业呈现优势或劣势的条件。

一些社会学家也对乡镇企业给予了特别关注。如前所述,魏昂德(Walder, 1995b)提出了“政府即厂商”的观点,即地方政府的角色类似于其辖区内地方企业的公司总部。魏昂德的研究工作建立在组织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了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认为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刺激了地方政府去发展当地企业,并提高了它们的管理和绩效。也就是说,政府担当起当地企业的总代理,从而解决了困扰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戴慕珍(Oi, 1999)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她认为,中国政府体制的财政改革和权力下放刺激了地方政府在其辖区内积极推动私营企业的发展。林南(Lin, 1995)则对社会网络在乡镇企业崛起中的作用,特别

是对乡村干部和政府官员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

在乡镇企业的研究中,理论解释丰富多样,但实证检验却相对薄弱。在这一方面,彭玉生(Peng, 2001)的研究是一项将理论与实证研究有力结合的出色范例。这项研究从魏昂德的地方政府监督机制和倪志伟的市场竞争机制出发,使用同一个地区的国有企业、乡办企业和村办企业在1993年的数据,对企业绩效进行了严谨的实证分析。他发现,乡办企业和村办企业都超过了国有企业。尽管企业规模与监控能力呈负相关,但乡镇企业的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在此基础上,彭玉生针对魏昂德的“政府即厂商”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两点修正:“首先,乡镇企业少有代理制的问题,这并非因为政府机构的直接监控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市场的间接监控更有成效……其次,当地政府从国家银行的借贷能力更好地解释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地方国营公司内部通融补贴的情况可能是有限的,而且即使这种情况存在时也多是经过经济计算考虑的”(Peng, 2001: 1365)。他的结论是:“与将乡镇企业的成功归因于政府机构监管的地方国家法团主义的论点恰恰相反,从市场规制的角度看,政府机构对管理人员的监管不仅因为企业的巨大规模而难有效果,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政府参与为管理者就亏损和补贴贷款方面的讨价还价提供了口实”(Peng, 2001: 1351)。在另一项研究中,彭玉生指出,改革初期,缺乏保护产权的正式立法,而市场体制也远不完善。在这种情形下,非正式制度如宗亲的团结和信任,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提供了保护,并降低了交易成本(Peng, 2004)。

但是,为什么整个乡镇企业会从1980年代的“异军突起”跌落到1990年代中后期短短几年内的“全军覆没”?尽管这一领域中的众多研究思路清晰,分析缜密,并且对其解释范围多附有谨慎的限制条件,但没有一项研究令人满意地预见或解释了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现象颇富戏剧性的结局: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在很短时间里或者转变为私营公司或者破产关门,而且这些变化是同步进行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各式各样的乡镇企业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有趣的是,在乡镇企业研究中,学者们对其当年的飞速崛起有着激烈持续的讨论,而对乡镇企业在90年代末的迅速消亡则鲜有研究。虽然不乏对乡镇企业私有化过程的研究(Li & Rozelle, 2003),却少有对乡镇企业消亡原因的深入考察。张春、麦考尔和王一江(Chang et al., 2003)姗姗来迟的实证研究分析了1984年至1993年间的乡镇企业的数据。他们发现,激励机制实施于经

营者对公司业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相反,“产权界定清晰的所有权形式比社区所有权促成了更好的企业绩效,即使是后者添加了对经营者的奖惩合同也仍然无法与产权明晰的企业相比”(Chang et al., 2003: 321; 参见 Kung & Lin, 2007)。

我们怎样解释乡镇企业这种戏剧性的命运?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研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 让我们首先排除现有文献中一些常见的解释和揣测。首先,市场条件的变化很难解释乡镇企业在短时间内的剧变。这些乡镇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并且有着不同的市场地位。虽然1990年代初期发生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乡镇企业也仍然应当有各不相同的命运。第二,即使我们假定乡镇企业面临着经济衰退的类似外部环境,仍然无法解释乡镇企业这种跨地区、跨经济领域的殊途同归。很难设想有着独立决策权的、理性的地方政府,会为减少亏损而不约而同地决定放弃乡镇企业。事实上,如果像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地方政府是乡镇企业的“所有者”,那么我们期待跨地区和跨时段乡镇企业的命运会像私营企业那样有着更为多样化的变化和命运。第三,一些理论模式提出,随着自由竞争市场条件的改善,乡镇企业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会日落下风。这样的解释也无法解释乡镇企业的消亡。虽然在这一期间市场条件有所改善,但不足以引发乡镇企业集体消亡这一巨变。最后,乡镇企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脆弱性,也对以往的论述中对乡镇企业相对于国有或私营企业在解决当地问题和调动资源上的溢美之词提出了质疑。简言之,乡镇企业短时间的集体消亡很难归因于外部经济或市场条件的变化,或者是不同类型的企业间相对竞争优势的变化,也很难从地方政府作为所有者的理性决策中找到答案。欲解读这一令人困惑的组织现象,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回顾乡镇企业的兴衰历程,我们从组织分析的角度来提出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乡镇企业步调一致的集体消亡首先反映了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科层组织的组织行为和政治过程。我们看到,正是地方政府主持推进了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改制的进程,也就是说,埋葬乡镇企业的恰恰是曾经“拥有”和支持它们的地方政府。已有的理论思路大多假定地方政府以一个理性所有者的身份行为处事。这个假定的进一步逻辑推演则是当地政府作为所有者会关注乡镇企业效率,并对此进行有效监管,协助其资源动员,并提供政治保护。但是,这种

假定并不切合实际。首先,有关科层制的组织理论早已提出,政府机构作为一个政治联盟有着多重利益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乡镇企业与其他当地企业都面对着地方政府的多重利益和诉求。其次,地方政府的行动并非都是理性的,也并非都热心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在干部轮换制度下,基层政府的负责官员通常在同一职务上只有3至5年的任期。在如此短的任期内,很难期望他们会对乡镇企业有着长远的规划。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并非一些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仅仅是地方辖区内的“社区政府”(community government)。相反,它们首先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部分,因而受到政府内部激励机制的影响。这一点认识对现有研究中的一些关键论点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例如,对于关心仕途生涯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更在意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和部门利益,而非当地公司的利益。正如中国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工作所表明的,90年代中期国家税收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分税制的实行,分离了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继续“拥有”乡镇企业的动力和热情。这意味着,乡镇企业兴衰这一组织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在政府组织和政治过程中寻找答案。

这一认识也对“所有权”的性质或者地方政府的监管作用提出了质疑。许多研究强调,地方政府在保护当地乡镇企业免受国家劫掠、资源调动以及解决当地问题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却很难找到支持这些说法的系统实证资料。而且,地方政府参与企业决策的代价是什么?一些新近的研究表明产权界定清晰的企业比“地方政府掌控的”企业绩效要好,即使后者实施了对管理人员的奖惩机制也不足以解决产权模糊带来的诸多问题(Chang et al., 2003; Peng, 2001)。最近的研究还表明,相当部分的乡镇企业管理不善,长期亏损,他们的生存依赖于侵吞仅存的集体资产。另外,一些研究也注意到,许多乡镇企业实际上是私人公司戴着集体的“红帽子”在运营(Woo, 1999)。但总体而言,已有的研究并没有认真分析乡镇企业内部的显著差异,对乡镇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经验观察。

以上讨论提出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对乡镇企业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组织现象的整体研究上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不足。第一,这些研究工作缺乏对微观过程的细致观察。例如,这些分析中常常忽略了政府官员对科层制内部激励和职业生涯的关注。研究工作时常拘泥于现有的抽象

理论模型,或依赖长距离观察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手段,因此,这些问题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对乡镇企业的诸多研究中,这一情形尤为突出。许多研究过分依赖官方统计数据或统计调查资料并且照搬西方学术界现有的理论模型,而对乡镇企业实际运行过程则知之甚少。

追求“简约”(parsimonious)的理论模型则是导致这一领域理论解释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理论解释基本上是事后(即看到乡镇企业兴盛现象之后)的自圆其说。研究者主要借用了有关激励机制的经济理论,强调了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利益关联(政府作为所有者)。这一思路隐含假定当地政府是一个“理性人”,作为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对乡镇企业有着长远的利益。但是简约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它有选择地分析某一机制,而对其他机制则不予注意。这一研究风格虽有助于对所研究对象进行简洁明快的剖析,但也可能因为特定理论模型的取舍而忽略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重要因果机制。例如,车家华和钱颖一(Che & Qian, 1998a)的研究重点放在“不完善的体制环境下”政府在资源动员和政治保护上所发挥的作用。但对其他重要问题,比如在政府内部对政府官员的奖惩机制和拥有所有权的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则未加分析。再如,许多学者强调指出,财政改革对刺激地方政府去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横加干涉的成本,集体资金的挪用,以及因为追求短期“政绩”造成的损失却没有得到认真评估。在我们看来,简约的理论模型本身并非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抽象概括,所以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包罗万象。我们的批评是:理论抽象应该建立在对研究对象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机械套用已有理论模式和经验数据。对于借鉴已有理论模式的研究工作者来说,更是需要充分意识到这些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和边界条件。

六、讨论与展望

回顾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研究工作,我们不难看到这一领域30年以来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这一方面得益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范式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中国社会的深远变革对学术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如前所述,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方法相近,多以经验描

述和文本解读为主,但在研究对象上有着以传统学科为本的印痕:社会学家往往特别注意与工作场所、家庭或社会福利相关联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基础上的社会不平等;政治学家更多关注政治制度、政府机构、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则侧重研究工业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对象的学术壁垒开始被冲破而浮现出共同的主题:第一,组织机制的作用,比如激励、组织环境,以及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互动如政企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等在研究中比比皆是。第二,学者们的研究课题也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如今,社会学家研究工业组织和政府行为,政治学家关注社会组织,而经济学家则对社会机制和政治治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中国组织现象研究正是得益于这种相互促进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组织学的分析角度对我们认识中国组织现象有怎样的启发意义?戴慕珍(Oi, 1992)在讨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时提出:“没有什么内在原因使得只是个人而非各类政府才有资格成为企业家。同样,也没有什么内在原因使得只有将稳定的产权分配到个人身上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Oi, 1992: 100)。的确,正如科尔曼(Coleman, 1974)所指出的,正式组织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正式法团(corporate actors),即那些从个人手里获得权力并将其用于团体目标的组织,才是现代社会社会结构的主要行动者”(Coleman, 1974: 49)。

另一方面,当我们分析的焦点从个人转移到正式组织时,就会引出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分析课题。正式组织由众多的、有着不同利益和生活经验的个人所构成;它们有稳定的规章制度和结构安排,以协调跨部门的活动;它们还设计了激励机制以诱导内部成员的行为活动;正式组织还有着依赖于其成员诠释的特定历史途径。因此,我们要对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正式组织(如私营公司、地方政府和其他法人团体)以及它们的关系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必须认真考虑与组织设计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组织内部与组织间的协调、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励设计与组织内部的雇佣关系,等等。这要求引入新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方法。以上述评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组织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组织和更广泛的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下面讨论中国组织现象研究领域需要改善的地方并提出批评性建议。在我们看来,这些批评与建议也涉及了这一领域中尚待深入发掘的研究课题。

首先,中国组织研究和组织学研究文献之间缺乏相互沟通。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多数研究既没有明确采用组织分析的理论和分析模型,也没有与组织学领域的研究课题和工作进行认真的对话。举例来说,对中国组织内部晋升的研究几乎完全没有参照组织学文献中数量众多的研究,也没有重点分析那些在组织学研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机制(例如,组织人口学 [organizational demography], 机会链 [vacancy chain], 等等)。相反,这些研究大多强调外部政治环境对组织内部运作的影响作用。这是殊为可惜的,因为组织分析可以提高这一研究领域概念精密化程度和分析力度,其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解释一系列问题,如中国组织内部的双重控制、企业和政府管制机构之间的关系、产权合法性的多重基础、企业间关系的机制以及政府对预算外资源的攫取行为,等等。

其次,尽管研究数量激增,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知识积累还远远不够。虽然在一些课题如“碎片化威权主义”和乡镇企业的研究方向上有着一定的学术积累,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工作很少自觉地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例如,魏昂德(Walder, 1986)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并没有在其后的有关文献中得到系统的实证检验。倪志伟(Nee, 1992)关于过渡时期组织演变过程的模型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即使是有关组织内部晋升模式的研究,文献中提出的理论模型对此后的研究也没有起到指导作用。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研究领域尚缺乏一个整合的学术群体。学者们受训于不同的领域,熟悉不同的研究传统,置身于不同的学术源流,加之学科之间缺乏交流,因而不能形成一个学术上的共同体。

第三,在有关组织内部的运作过程方面,研究工作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层。从上面评述的研究工作可见,目前我们对中国组织的正式制度和宏观过程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我们对组织内部的行为运作却知之甚少。以中国组织研究领域两个特别活跃的方向为例。其一是有关社会网络作用的研究。近年来大量的研究探讨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比如找工作),建立组织间联系,以及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等方面的作用,但这些研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收集定量数据,而在系统地理解(即提供超越常识的解释)微观机制上则着力甚少。因此,我们并不了解这些社会网络是如何发生效用的,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它们被选择,被激活,或者被弃置不用。其二是有关晋升模式的研究。正如我

们的评述所示,目前的一系列研究均得益于几项大规模问卷调查,从而在宏观层面展示了晋升的总体状态。然而,工作机会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互动的?组织看重“忠诚”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晋升的标准是如何制定和实施的?我们对于组织内部的晋升过程和机制以及其他形式的工作流动机制近乎一无所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社会学在组织领域的早期研究,这些研究工作通过细致深入的实地考察和近距离观察为理解组织现象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实证基础,至今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仍属上乘之作。古尔德纳(Gouldner, 1964)对一家矿业公司内部权力关系的研究挑战了传统观点,即组织规则是提高效率的工具。古尔德纳发现正式规则往往用来替代严密监督,成为避免冲突的一种管理手段。布劳(Blau, 1955)对美国政府两个社会福利机构的研究显示了规则在适应当地情况和引入员工主观评价时的灵活性。最后,法国社会学家克罗泽(Crozier, 1964)对两个法国政府机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法国科层制度和管理风格的特点。与古尔德纳和布劳不同,克罗泽的研究发现在法国科层制组织中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他对此的解释是,规则是组织中的弱者用来保护自身的手段,以免受管理者随意处置的侵害。我们也从比较历史社会学有关正式组织的早期研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本迪克斯(Bendix, 1956)研究对比了市场观念和苏联意识形态造就的两种管理思想,以及英国和俄罗斯两种工业化模式,进而展示了社会环境对塑造组织和工业界内部权力关系的重要影响。他提出,在工业化早期需要在公众面前彰显工业存在的理由,这一需要塑造了早期管理理论的风格。这一思路指出意识形态和文化是理解组织和管理实践的重要切入点,为我们研究组织现象如何被历史背景和全球化影响所塑造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框架。这些研究范例将清晰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经验材料相结合,把微观过程与社会学的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家布劳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通过对细节的孜孜以求,我们希望获得对现代社会重要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所需要的系统知识”(Blau, 1955: 5)。今天,这仍然应该是社会科学和组织研究的至上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诸领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建立正式模型或者采用定量分析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趋势,其结果是建立在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数据分析基础上的理论假设检验成为研究的主流

风格。有关中国组织的研究也正日渐被这种学术风格所影响。近年来有关中国组织的研究常常建立在问卷调查和对组织现象长距离、宏观层面观察的基础之上。在英文期刊发表文章的强大压力诱导研究人员参与了生产论文的学术游戏。讽刺的是,当学者们竞相投入大量精力去学习理论范式和精密的统计技巧,花费更多的时间收集问卷或其他可供定量分析的数据时,他们距离组织中的实际过程却越来越远,这一脉络里涌现出的研究工作也大多苍白无味。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反思统计模型对理解历史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时提出:“让我提出一项小小的建议:经济史需要提防糟糕的数字。计量技术越巧妙,诉诸量化的材料越丰富,我们就越需要这样的提防警戒”(Landes, 1994: 654)。在我们看来,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引以为戒。

在理论方面,我们也迫切需要发展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魏昂德指出:“列举一系列‘原因’相对容易,但作为一种解释或理论则必须阐明在可能的原因和可能由之引发的政治后果之间的联系,即其中蕴含的社会进程或体制机制。许多近来涌现的解释忽视了这些联系,因此显得含糊不清而难以评估。我们对历史变革的理解的深度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摒弃讨论哪些因素或变量重要与否,并着眼于哪些社会过程和机制可能发挥了导致变迁的作用”(Walder, 1994: 303)。的确,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阐明因果联系背后的机制。而一个好的理论的前提是,它应该是建立在对实际变化过程、社会制度与历史背景的贴切把握之上,而不是一些现成的、流行的概念和模式与经验资料的拼凑,更不能让这些现成的说法限制我们的理论想象和解释的空间。20世纪60年代前后组织研究领域中的行为学派力主跳出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范式,着眼于研究组织过程中的实际行为和现象,以便从中提炼新的理论解释(Cyert & March, 1963)。这一思路对于今天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方向,仍然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地方政府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组织学的视角提出了以下需要回答的课题:第一,正式组织是基于多种利益和目标之上的政治联盟。因此,一个组织内的偏好和目标时常是不一致的,又是变动不居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对地方政府的作用需要重新审视,需要解释这一政治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解决目标冲突这一困境的。第二,我们需要解释地方官员

与他们的任务环境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地方官员在日常工作中面临多重任务的情况下会对这些任务的轻重缓急综合加以考虑。他们对象征性与实质性的任务和活动有着明确的区分,并对此予以不同处置。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对组织注意力分配机制没有一个深入了解,就很难理解和解释政府行为。第三,官场职业生涯是各级政府(如乡镇政府)主要领导最为关注的问题。晋升机制中的年龄限制成为影响官员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干部轮换制度则激励官员们不惜牺牲地方的长期利益而追求急功近利的“政绩”。第四,对地方政府的能力也需要进一步从动态中进行分析。近年来的强化纵向“条条”垂直领导恰恰弱化了地方政府对“兼容属性”的整合,限制了它们应对解决当地问题的能力,进而诱发了地方政府间的同谋行为(Zhou, forthcoming)。以上的组织分析视角为我们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研究问题: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发展的过程中怎样受到这些科层制度的限制约束?它们又是如何克服、逾越这些障碍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关注政府的微观行为和实际运行过程。

赫希曼(Hirschman, 1970)注意到社会科学中一味追求理论范式和假设检验的倾向,提醒我们警惕“对理论范式的追求成为理解的障碍”(the search for paradigm as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这一陷阱。这一告诫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尤为贴切。我们时常观察到这样一种情形:研究者为现有文献中的概念和模型所左右,有意无意间寻找符合现有范式的证据或者给出简单的“解释”,而不愿意选择更加艰辛的探索之路去发现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研究文献中,有关中国组织的知识并没有与论文的发表数量成比例地增长。一方面,学术论文大量涌现,观点、概念、理论猜测不断推陈出新;而另一方面,系统认真的实证研究却十分薄弱,在知识积累上步履缓慢。在大量堆积的学术成果面前,中国的组织现象对研究者和读者来说仍然是那么遥远、模糊和神秘。

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样的陷阱呢?在很大程度上,这需要宏观学术制度和专业领域层面的变革,同时,学者的取向也在推动着学术研究的方向。黄宗智在讨论中国研究范式时指出:“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微观层面的详细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

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Huang, 1991: 316)。这一忠告十分贴切地道出了我们对中国组织现象研究领域今后发展前景的基本看法。

综上所述,在过去 30 年间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领域业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学术群体大大扩展,研究工作日臻严谨细致,显示了这一领域充满希望的未来前景。但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那样,未来发展之路上也有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希望本文的述评和讨论有助于澄清我们知识结构中的缺失之处和研究中需要改进的方面。特别是社会科学和组织学之间更密切的互动关系将为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持久强劲的动力。最后,我们特别指出,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如政府行为、企业制度,尤其是组织内部运作过程机制等中国组织现象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材料。我们相信,加强中英文学术研究文献之间的互惠交流将会大力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 Allison, Graham T.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Barnard Chester I. 1938,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ron, James N. 1984,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tratif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
- Baron, James N. & Jeffrey Pfeffer 1994,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and Inequalit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7.
- Bendix, Reinhard 1956,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Ide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Wiley.
- Bian,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 Bian, Yanjie &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 Bian, Yanjie, John R. Logan, Hanlong Lu, Yunkang Pan & Ying Guan 1997, "'Work Unit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Housing: Observations o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XVIII.
- Bian, Yanjie, Xiaoling Shu & John R. Logan 2002,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 79.
- Blau, Peter M. 1955,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A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wo Government Agenc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o, Yang 2001, "Careers inside Organiz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motion Determination in Reforming China." *Social Forces* 80.
- Chang, Chun, Brian P. McCall & Yijiang Wang 2003, "Incentive Contracting versus Ownership Reforms: Evidence from China'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 Chang, Chun & Yijiang Wang 1994, "The Nature of th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
- Che, Jiahua & Yingyi Qian 1998a, "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 1998b,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China's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s* 14.
- Chen, Chih-pu Jay 2004, *Transforming Rural China: How Local Institutions Shape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 Coleman, James S. 1974,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New York: W.W. Norton.
- Crozier, Michel 1964,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yert, Richard Michael & James G. March 1963,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Dalton, Melville 1959, *Men Who Manage*. New York: John Wiley.
- Davis, Deborah 1992, "Job Mobility in Post-Mao Cities." *China Quarterly* 84.
- Davis, Gerald Fredrick & Doug McAdam 2005, *Social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J. &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 Dixit, Avinash K.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Downs, Anthony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 Wavel & Press, Inc.
- Edin, Maria 2003, "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 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173.
-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 Mark Selden 1991,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ouldner, Alvin Ward 1964,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Griffiths, Franklyn 1971, "A Tendency Analysis of Soviet Policy-Making." In H. G. Skilling & F.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oves, Theodore, Yongmiao Hong, John McMillan & Barry Naughton 1995, "China's Evolving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 Guillen, Mauro 1994, *Models of Management: Work, Authority, and Organiz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uthrie, Doug 1997, "Between Markets and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Refor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 1999,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milton, Gary G. & Nicole Woolsey Biggart 1988,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Haman, Michael T. & John Freeman 1977,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 Harding, Harry 1981,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22.
- Huang, Philip C. C. 1991,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
- Huang, Yasheng 1994, "Information, Bureaucracy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47.
- 1995, "Administrative Monitoring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43.
- 2003,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fferson, Gary H. & Thomas G. Rawski 1994,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 2002, "China's Emerging Market for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0.
- Jefferson, Gary H., Thomas G. Rawski, Wang Li & Yuxin Zheng 2000, "Ownership, Productivity Chang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8.
- Keister, Lisa 1998, "Engineering Growth: Business Group Structur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 2001, "Exchange Structures in Transition: Lending and Trade Relations in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 2004, "Capital Structure in Transi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Strategies in China's Emerging Economy." *Organization Science* 15.
- Kung, James Ka+sing & Yi-min Lin 2007, "The Decline of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World Development* 35.
- Lampton, David M. 1987,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mpton, David M. & Sai+cheung Yeung 1986, *Paths to Power: Elite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Landes, David S. 1994, "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 Explaining Big Changes by Small Even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7.
- Lee, Ching Kwan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 of Lab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1998,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24.
- 1999,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China Quarterly* 157.
- Li, Bobai & Andrew G. Walder 2001,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 Li, Cheng & David Bachman 1989, “Localism, Elitism and Immobilism: Elite 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Mao China.” *World Politics* 42.
- Li, Hongbin & Scott Rozelle 2003, “Privatizing Rural China: Insider Privatization, Innovative Contrac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China Quarterly* 176.
- Li, Hongbin & Li An Zhou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 Lieberthal, Kenneth & David M. Lampton 1992,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eberthal, Kenneth & Michel Oksenberg 1986,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U. S. Dep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For sale by the Supt. of Docs. U. S. G. P. O.
- 1988,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n, Nan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 Lin, Nan & Yanjie Bian 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 Lindblom, Charles E. 1959,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
- 1979, “Still Muddling, Not Yet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 Lipsky, Michael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u, Xiaobo & Elizabeth J. Perry (eds.) 1997,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 E. Sharpe.
- March, James G. 1988, *Decisions and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 Y.: Blackwell.
- March James G. & Johan P. Olsen 1979,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Organizations*.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March, James G. & Herbert Alexander Simon 1958,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 Merton, Robert King 1952, “Reader in Bureaucrac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Meyer, John W. &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 Milgrom, Paul & John Roberts 1992,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Moe, Terry M. 1991, “Politics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s* 7.

- 1994, “Integrating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Positive Theor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4.
-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 Barry R. Weingast 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 Mookherjee, Dilip 2006, “Decentralization, Hierarchies, and Incentives: A Mechanism Desig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LIV.
- Naughton, Bary 1994, “Chine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ivatization from Be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 1996, *Graving out of the Pl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1991, “Social Inequality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 Nee, Victor & Yang Cao 1999,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Mixed Econom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
- 2002, “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s: 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9.
- O’ Brien, Kevin J. & Lianjiang Li 1999,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1.
- O’ Brien, Kevin J. & Rongbin Han 2009, “Path to Democracy? 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 Oi, Jean C.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i, Jean C. & Andrew G. Walder (eds.) 1999,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ish, William L. & Martin King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arson, Margaret M. 2007, “Governing the Chinese Economy: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7.
- Peng, Yusheng 2001, “Chines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as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 2004,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 Perrow, Charles 1986, *Complex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Ess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Perry, Elizabeth J. 1989,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rld Politics* 42.
- Pressman, Jeffrey L. & Aaron Wildavsky 1984, *Implement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Qian, Yingyi & Gerard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 Qian, Yingyi, Gerard Roland & Chenggang Xu 1999, "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 2006, "Coordin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M-Form and U-Form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
- Qian, Yingyi & Barry 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 Qian, Yingyi & Chenggang Xu 1998, "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5.
- Rawski, Thomas G. 1995,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eform Experience." *China Quarterly* 144.
- Schumann, Franz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ott, W. Richard 2003,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fif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Shirk, Susan L.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u, Xiaoling & Yanjie Bian 2003, "Market Transition and Gender Gap in Earnings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81.
- Shue, Vivienne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tic Politic*.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on, Herbert 1947,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
- Skilling, H. Gordon 1966,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8.
- Skinner, G. William 1985,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V.
- Skinner, G. William & Edwin A. Winckler 1969, "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A Cyclical Theory." In A. Etzioni (ed.), *A Sociological Reader on Complex Organiz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Solinger, Dorothy J. 1995, "The Chinese Work Unit and Transient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Modern China* 21.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J. G.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 Tirole, Jean 1986, "Hierarchies and Bureaucracies: On the Role of Collusion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 2.
- Tsai, Lily L. 2007,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 Chin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
- Tsou, Tang 1986,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 1994,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23.
- 1995a,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1995b,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2003,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 Walder, Andrew G., Bobai Li & Donald J.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 Wang, Feng 2007, *Boundaries and Categories: Rising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k, David L. 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C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by H. H. G. & C. W.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ick, Karl E. 1976,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oosely Coupled Syste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1.
- 1982,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ong Loosely Coupled Elements." In P. S. Goodman & Associates(eds.),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Weitzman, Martin L. & Chenggang Xu 1994, "Chines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
- Whiting, Susan H. 2000,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Martin King 1973,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 1980, "Bureaucracy and Antibureau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G. M. Britan & R. Cohen(eds.), *Hierarchy and Society*.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 1985, "The Politics of Life Cha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Y. M. Shaw(ed.),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R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Whyte, Martin King & William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 Wilson, James Q. 1989, *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 Wong, Christine P. W. 1991,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an Era of Fiscal Decline: The Paradox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Post-Mao Era.” *China Quarterly* 128.
- Woo, Wing Thye 1999, “The Real Reasons for China’s Growth.” *The China Journal* 41.
- Yang, Dali 2004,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ang, Xiaowei 2001,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Elite Dualism, and Elite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4.
- Zhao, Dingxin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 Zhao, Wei & Xueguang Zhou 2004,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ransition: Changing Promotion Patterns in the Post-Mao Era.” *Organization Science* 15.
- Zhou, Xueguang 1993,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 1995, “Partial Reform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the Post-Mao Er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8.
- 2001, “Political Dynamics and Bureaucratic Career Patter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4.”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 2004,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rthcom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llu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Modern China*.
- Zhou, Xueguang, He Cai & Qiang Li 2006,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and Firm Behavior: Theory vs. Evidence.” In A. S. Tsui, Y. Bian & L. Cheng (eds.), *China’s Domestic Private Firm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Ammonk, NY: M. E. Sharpe, Inc.
- Zhou, Xueguang & Olga Suhomlinova 2000, “Redistribution under State Socialism: A USSR & PRC Compariso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8.
- Zhou, Xueguang, Nancy B. Tuma & Phyllis Moen 1997,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atterns of Job Shifts in Urban China: 1949-199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 Zhou, Xueguang, Wei Zhao, Qiang Li & He Cai 2003, “Embeddedness 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作者单位: 斯坦福大学、上海高校社会学 E 研究院(周雪光)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赵伟)

责任编辑: 杨可

Abstract: B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ases in Southwest China, this article proceeds from the point of “field of Qi”, a special expression of emotions of Chinese, and studies the occurring mechanism of mass disturbances, which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ix layers of conformation of the “field of Qi”, on the base of which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two kinds of mass disturbances: one is the mass disturbance based on stakeholders, the other is based on non-stakeholders. In the end,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of mass disturbanc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bstract: Based o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interviews with 23 people aged 60–82 in 2008, this article reports an in-depth study of life trajectories among low-income elder people in Beijing.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 variety of trajectory patterns exhibit among those elders. With three directions in old age (improving, level and declining) and patterns over lifespan (smooth and fluctuating), their trajectories are categorized into six types. Ca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each type of trajectories. Elder’s life course paradigm is used in this study to analyze elder people’s life stories. 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 (1) although all of the poor elders belong to “the poor” in current stage, they are not homogenous group since they have diverse processes of poverty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2) the causes of old age poverty are mainly rooted in previous early-lif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factors linked to late-life stage; (3) in Chinese context, the unexpected life events created under abrupt social transitions accounted much for the fluctuating of elderly people’s poverty trajectories; (4) five types of 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old age poverty.

REVIEW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surve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is to identify major research themes and activities on Chinese organizations,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the causal mechanisms identified in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We organize our survey by the disciplinary fields —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but we aim to contrast studies across these academic fields to highlight intellectual connections, bifurcations, or departures.

We emphasize the potential, mutual benefit betwe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developed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While recognizing the impressive contribution of this literature, we also intend this survey to be critical in the sense that we are especially biased toward emphasizing the unsolved problems in this area, identifying intellectual gaps and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among these research camps, with the hope that future efforts can overcome these barriers.

COMMENTARY AND DEBATE

Body: A new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theory
..... *Zheng Zhen* 187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theory according to som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body theories, and indicated this perspective was influenced by Nietzschean philosophy and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body. The author laid ope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erspective and raised criticisms of Cartesian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of Cartesian subjectivism and intellectualism. Through these discussions the author outlined the validities of this perspective in reflecting on and criticizing the human society.

After Blau-Duncan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Transmutations or challenges
..... *Zhou Yi* 206

Abstract: There are numerous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lau-Duncan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for this study; then explores the transmutations of the model since its appearance and the challenges it meets from six different yet complementary angles — sex, ethnicity, cohort comparison analysis, political loyalty, work unit status, and social network. It defin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lau-Duncan model, giv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ositions of the six perspectives at the individual, relation,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levels. It concludes that these complementary researches on the Blau-Duncan Model explain the status attainment objectively and convincingly, but some of them depart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ascribed and achieved factors in individual mobility process.

BOOK REVIEW

The Oppressed Subaltern and the Subaltern Liberation:
Reading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Jiang Fawen* 226